



## 去延安：文化与民族解放



汇编 52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2 年 5 月

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隐喻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据地延安都是一个设想、试验、建设新社会和新人类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工农兵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演绎者，成为他们所写、所唱、所演、所处的故事的主角。本期汇编的图片是用“延安十年”（1935-1945）期间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照片拼贴而成。

## 封面

---

前图：京剧团演员在练功

后图：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生在自建的席棚排练戏剧

图源：延安红云平台

# 去延安：文化与民族解放



汇编 52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2 年 5 月





上图：学生在鲁艺图书馆阅读  
下图：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  
图源：延安文艺纪念馆、维基共享资源/中国画报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进亲人怀。  
——《回延安》贺敬之作于 1956 年

## 服务人民的艺术

1942 年 5 月 2 日下午 1 点 30 分，中国西北城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凉爽的春日。城中唯一的三层楼房是昵称“飞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驻地。大厅中人声鼎沸，平常用餐的家具被腾空，只留下一排排长椅，以及一张为准时入场的毛泽东准备的桌子。与会者将“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sup>1</sup> 尽管确切参会人数未有记载，但在几天前，本次会议主持人，也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发出了一百多封邀请函。邀请函用非本地产粉红纸张印成，说明中共高层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汇聚一堂的，既有全国知名学者、军事指挥者、政治干部，也有出版、研究、报刊、电影、摄影、戏剧、诗歌及青年社团等文艺工作战线的代表。

在会前几个月中，毛泽东已与一些知名学者往来通信数十封，私谈数次，分析各种不同的左翼文艺思潮，发现当前文化上的迫切问题。毕竟，毛泽东除了是一位政治领袖之外，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作具有深厚的古文底蕴，记录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与勃兴。他的诗词描绘了很多次战役、反围剿斗争的场面，其中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从他参与创建的井冈山共产主义根据地，到引导红军西行的伟大长征。在 1935-1945 年延安时期，他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理论、实践文章，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就在有着标志性拱门的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就各种主题进行研究并撰写大量文章，从军事策略到哲学，从党的建设到政治经济学，从土地改革到国际主义精神。其中就有汇编成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系统分析了文学艺术对于推进革命斗争的作用。这篇著作于延安座

---

<sup>1</sup>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51-268 页。



谈会召开后的次年出版。在文章中，毛泽东等人提炼了共产主义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多年来的经验与实践。

回到 1942 年那个下午，在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里，凯丰宣布座谈会第一次大会正式开始。座谈会历时三个星期，共开了三次大会。在这三次大会中，毛泽东在会场中唯一的桌子前就座，仔细记录下与会者提出的问题要点。后来出版的《讲话》就援引了这些辩论和对话。

毛泽东在引言中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了认识敌人，毛泽东对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开头说：“事实就是：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毛泽东指出，百年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愤怒与苦难已使得中国具备了革命条件，各种政治势力能否奋起反抗中国权贵阶级、推动独立事业来日方长。革命发展的一个例证是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根据地争取群众支持的工作，包括争取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毛泽东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sup>2</sup>

他坦承，军事上的胜利是不够的，必须统一全党思想，将无产阶级主体性置于革命工作的中心。“配枪军队”和“文化军队”执行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壕沟里的战斗和赢得民心民意的战斗。文化工作对这种思想改造至关重要，有助于工农兵认识到他们才是自己故事和历史的主人公。

为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列出了文学艺术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者必须采取一种“阶级立场”，即坚定地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艺术家在斗争中也应将自己视作劳动者的一分子。关于态度和对象，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作家、艺术家对“歌颂”

---

<sup>2</sup> 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3/mswv3\\_08.htm](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3/mswv3_08.htm).

和“暴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首先，应该歌颂人民的斗争、理想，歌颂“光明”。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暴露黑暗”，将批判指向敌人，并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同盟者的缺点。

毛泽东在引言中着重指出了在延安出现的一些重要争论，这些争论使得召开座谈会势在必行。毛泽东对早期的五四运动一代人提出了批评。五四运动是由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在 1919 年发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觉醒运动，不少人在那场运动中走上政治道路，现在又来到了延安。虽然他们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形成，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民乃至农民来说仍然非常陌生。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没有使用“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说话。五四运动发生 20 年之后，国家政治局面发生新情况，需要新型的文化生产和新型知识分子，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只有去到农村，投入脑力、体力的双重劳动，才能将自身改造为革命工作者，创作出真正服务人民的艺术作品。毛泽东认为这需要“感情上起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为理解那些文化工作者也就是毛泽东讲话的聆听者以及他们来到延安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延安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心的来龙去脉。几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踊跃前往延安，带去了各种革命文化工作理念与实践。延安座谈会的目的就是拨乱反正、统一思想。





上图：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  
下图：文学系学生前往晋西北前线  
图源：延安红云平台



## 去延安

“我只有离开这个家，但是如何离开呢？”1938年春，一位生活学习在西南城市成都的16岁少女写道。<sup>3</sup>她在信中谈到祖国现状时表达了失望沮丧之情。数月前，史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的武装冲突导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对华侵略、占领始于1931年、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长达14年。此时战争全面爆发，将夺走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导致大批人流离失所。<sup>4</sup>大中学校将学生进行疏散，有些去了比较安全的地区避难，有些则积极参与代表时代精神的民族救亡斗争。这位少女在信中继续写道：“所以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到陕北去。有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考虑时期，我想遍了所有别人用过的方法，只有这是能够不令我失望，是能够让我生存下去的地方。”<sup>5</sup>她就是决定长途跋涉前往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数千名学生、学者之一。

延安隶属陕西省，位于黄土高原，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的历史可上溯3000年，在人口南迁前，自古就是枢纽之地，黄河、黄土、黄帝都在延安留下传奇。<sup>6</sup>到1937年共产党人以延安为边

---

<sup>3</sup> 范雪“到陕北去：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选择”，《保马》，2020年3月16日  
<https://mp.weixin.qq.com/s/CKzJ39SCb78OrNYBS3Yhyw>

<sup>4</sup>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sup>5</sup> 范雪“到陕北去：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选择”，《保马》，2020年3月16日  
<https://mp.weixin.qq.com/s/CKzJ39SCb78OrNYBS3Yhyw>

<sup>6</sup> Kirk A. Denton, 'Yan'an as a site of memory', in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ed. Marc Andre Matten (Leiden: Brill, 2012), 239.

区首都时，它变成了一个“仅有约一万居民、尘土飞扬的贫穷边陲小镇”。<sup>7</sup> 延安也是伟大长征（1934-1935 年）的目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对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围剿，而长征就是共产党从其江西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撤退。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位委员中有六位参加会议。此时红军已遭受重大损失，士气大伤，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主要领导地位，使他主掌中国革命进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走过了两万五千里路程，翻越了 18 座大山，渡过了 24 条江河之后，参加长征的战士只有 8000 名到达延安。<sup>8</sup> 原先的 86000 人，兵分三路踏上征程，路上很多人或饿死、或牺牲、或投降、或放弃。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sup>9</sup> 在延安的窑洞中，斯诺作为外国记者首次采访了毛泽东，并于 1937 年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报道共产主义革命的早年岁月。那一年，延安成为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之后的“延安十年”中，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人组织动员了边区数千万农民，在城市争取群众支持，将党员队伍扩大到 120 万人，红军战士增加到一百万人，并有数百万武装农民的支持。<sup>10</sup>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距离到达延安 14 年时，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文化中心，延安令世界各地艺术家、作家、城市知识分子为之神往。1938 年，画家、教育家王式廓从西安徒步 300 公里前往延安，途中还染上了疟疾。尚未享誉世界的青年漫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从日据的上海出发，取道香港、广州等南方城市，最终到达延安。同年，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丁玲也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些文学艺术家是 1943 年前

---

<sup>7</sup>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75.

<sup>8</sup> Meisner, *Mao Zedong*, 74; ‘A quick look at the epic journey of the Long March’, *CGTN*, 1 July 2019, <https://news.cgtn.com/news/2019-07-01/A-quick-look-at-the-epic-journey-of-the-Long-March--HYhdCulxPG/index.html>.

<sup>9</sup>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190.

<sup>10</sup> Meisner, *Mao Zedong*, 75–76.

往延安的约 4 万名知识分子中的一员。<sup>11</sup> 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地主、贵族、小商户、富农家庭，他们离开舒适的城市，冒着风沙雨雪跋涉上百甚至上千公里。

在那些求索的早年岁月，形形色色的文化组织成立、合并、更名、解散。工厂、学校、部队、农村根据地纷纷成立了文艺团体。街头诗歌小组成立了，其中一个小组的口号是“不让农村的每面墙、路边的每块石头留下空白……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群众而写而唱……”<sup>12</sup> 上世纪 30 年代初兴起的剧团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股有生力量，尤其受到农村文盲人口的欢迎。剧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口头传达当下最迫切的问题，解释共产主义方针，发挥着不同于政治宣传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赢得人民的信任。1936 年访华期间，埃德加·斯诺对剧团的使命和创造力印象深刻，称其为最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武器”。他认为：“艺术与宣传并无明确区隔，唯一的区别在于人类经验可以理解或无法理解。”<sup>13</sup>

然而，由受过良好正规教育的职业、业余作家组成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仍继续主导着文化工作。农民、工人、士兵鲜少参与文化工作，传统民间艺术也少有出现。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抱着美好期冀奔赴延安，但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当地农民有着天壤之别。后来出任文化部长的小说家、剧作家茅盾指出：“外地去的作家对解放区的生活不适应，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发生一些争论。”<sup>14</sup> 他接着说：“作家原来把延安理想化了，觉得什么都好。但到了延安之后，理想与现实有了距离，这样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出来了。”所谓“议论”指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在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属性、政治责任上与党存在分歧。

---

<sup>11</sup> 马克锋“数万青年为何冒着风险奔赴延安？”，《人民论坛》，2021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1/2021-02-25/150570.html>

<sup>12</sup> Ellen R. Judd, ‘Prelude to the “Yan’an Talks”: Problems in Transforming a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Modern China* 11, no. 3 (July 1985): 377–408.

<sup>13</sup>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15–116.

<sup>14</sup> 丁晓平“胡乔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读书报》，2012 年 5 月 28 日  
<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1/18270.htm>





上图：歌舞团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  
下图：美术系学员在上素描课  
图源：延安文艺纪念馆、延安红云平台

## “暴露黑暗”还是“歌颂光明”？

延安座谈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五位知名的党员作家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该报主编丁玲与艾青、罗烽、王实味、萧军等人，批评根据地读物匮乏、条件不利于艺术创作、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妇女地位低下等。文章的核心在于艺术独立性问题以及党对艺术创作的限制。文学艺术的作用是“歌颂光明”，颂扬党和人民的功绩？还是“暴露黑暗”，指出中国社会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sup>15</sup>

党内主管文艺工作、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周扬同志持相反的观点。他在 1941 年发表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中一针见血地反驳了众人提出的批评意见。

……在农村，生活和奋斗的新故事需要艺术的诠释。如果你现在没什么可写，那就让对生活的强烈渴望来取代你的创作冲动。走出窑洞，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定会有所帮助。<sup>16</sup>

数次思想交锋促成了延安座谈会的召开。会上，主要反对派萧军受毛泽东邀请，率先在第一次大会上发言。之后三周，在文艺各领域的分组讨论中、在发表的文章中、在 1942 年 5 月 16 日和 23 日举行的另外两次大会上，辩论仍在继续。

---

<sup>15</sup> Kyna Rubin, ‘Writers’ Discontent and Party Response in Yan’an Before “Wild Lily”: The Manchurian Writers and Zhou Ya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no. 1 (September 1984): 79–102; Judd, ‘Prelude to the “Yan’an Talks”’, 377–408.

<sup>16</sup> Rubin, ‘Writers’ Discontent and Party Response’, 90.



会议的要点经过整理、修改、思考。一年后，在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极具影响力的作家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出版。

在出版的文本中，结论分为五个要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中心问题。苏维埃领袖列宁 1905 年的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把文化工作的目标定义成服务于“千百万的劳动人民——国家的花朵、力量和未来”，<sup>17</sup> 毛泽东借鉴了这一观点，还把“人民”的概念扩大到了工人以外的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定位为群众中的工人。第二点着重讨论“如何去服务”，权衡了普及革命思想的需求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紧迫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写道：“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换言之，革命文艺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第三点讨论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其中就有讲话中一段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文化脱离革命工作的名言：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泽东将政治，尤其是阶级政治，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坚决反对文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观点。

第四部分中，毛泽东在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根除残存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世界观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最

---

<sup>17</sup> V. I. Lenin,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44–4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nov/13.htm>



后一部分指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到延安投身革命，许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延安座谈会及后来的文章不仅是对一小批知识分子批评家的回应，它们也属于这场更为广泛的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不少党员中也仍然存在）的思想斗争。

这次历史性座谈会是 1942-1944 年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整风运动力求在党内统一思想，缩小艺术家、作家的工作与广大农民现实生活之间仍然存在的鸿沟。<sup>18</sup> 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环境是马克思主义历来探讨的问题。马克思在 1845 年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还在于改变世界。”半个世纪后，安东尼奥·葛兰西呼吁培养能够“积极参与日常生活”的“新知识分子”，“不仅只是演说家”，还应是建设者、组织者、“不懈的说服者”。<sup>19</sup> 毛泽东也认为，要培养此类“新知识分子”，投身延安的传统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超越其阶级出身。

革命事业需要培养新知识分子，带来植根于中国农村文化的新革命思想，也就是群众文化、人民文化。在延安的十年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文化活动和大规模扫盲运动，农村扫盲率高达 90%。毛泽东在座谈会召开时估计，延安识字的干部已经超过了一万人。在此过程中，他们破旧立新，学着理解周遭的世界。

与此同时，必须积累人民的文化力量。这就需要“提高标准”，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言：“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同时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然而，新的群众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列宁早在俄国革命初期就对积累工人力量这一相同问题进行思考：

---

<sup>18</sup> Judd, ‘Prelude to the “Yan’an Talks”’, 377–408.

<sup>19</sup> 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theses>; Antonio Gramsci, ‘The Intellectuals’,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and ed. Q. Hoare and G.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3–23,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problems/intellectuals.htm](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problems/intellectuals.htm);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New Intellectual*, Dossier no. 12, February 2019,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new-intellectu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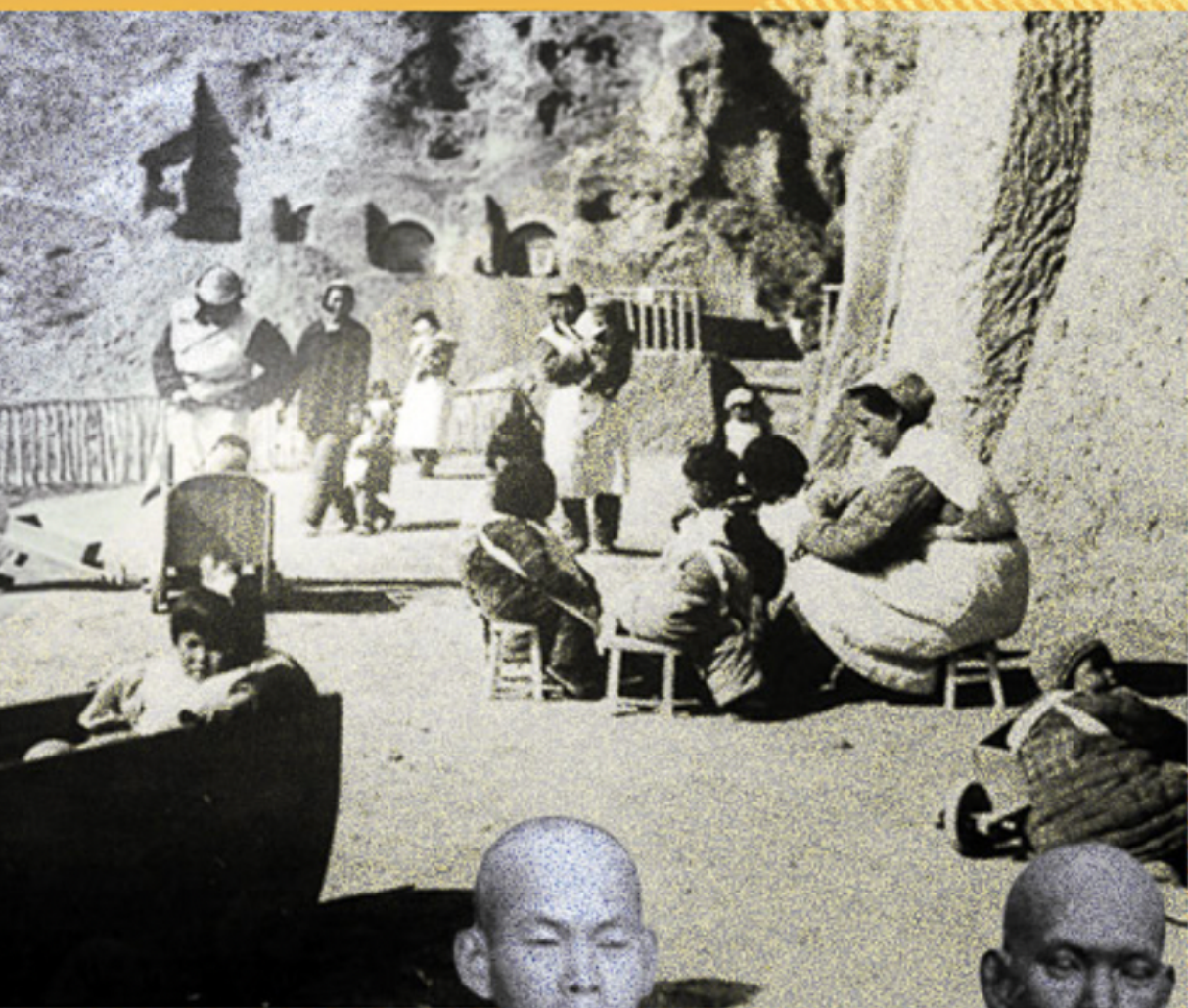
苏维埃力量不是创造奇迹的法宝，不会在一夜之间治愈过往的一切坏处——文盲、文化缺失、残酷战争的后果、资本主义掠夺的影响。但它确实为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它使得从前的受压迫者有机会挺直腰杆，将整个政府、整个经济管理、整个生产管理尽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sup>20</sup>

在延安，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第一次在歌曲、诗歌、艺术作品、戏曲中学会挺直腰杆。这是创造新人类和新社会的必备条件。农民成为生活的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推动历史文化前进的主体。在《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人民对文艺的渴望：“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扫盲任务固然紧迫，但并不应视其为欣赏、创作文艺作品的先决条件，因为群众文化属于人民。同时，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缩小自身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差距。

---

<sup>20</sup> V.I. Lenin, 'On Soviet Power',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248–24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9/mar/x08.htm>.





上图：鲁艺托儿所的妇女和儿童

下图：王朝闻教授在创作雕塑

图源：延安红云平台



## 旧瓶新酒

延安座谈会召开时，马可是鲁迅艺术学院（也称“鲁艺”）的一名音乐学员。鲁艺是延安培养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天主教堂改造而成。马可在《北京周报》1962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毛主席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些学员。”<sup>21</sup> “我们想尽快到群众中去，学习、磨炼自己，为革命尽一份力。”延安座谈会召开十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动员文学、戏剧工作者去被毛泽东称为“大课堂”的农村。<sup>22</sup> 马可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山上艰难跋涉了一天之后，受到一群敲锣打鼓、手拿扫帚的农民的欢迎。令他吃惊的是，当地农民已经清扫了长达十里的道路，盼着这些“毛主席派来帮他们翻身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到来。<sup>23</sup>

尽管抱有热情，马可承认起初对听到的民乐曲调颇为不屑：“我觉得有些单调，不够精致和所谓的‘艺术性’……总之，我既不喜欢他们，也不唱他们的歌。”在与群众接触的过程中，马可的想法开始转变：“我（开始）感受到他们音乐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我开始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它显得如此热情奔放，如此简洁自然，好像每一个山谷、每一条河流都回响着旋律。我忘情地和其他人一起，大声地、久久地歌唱着。”深入乡村是马可自我改造的一种行动，他要克服作为知识分子、职业艺术家在面对人民群众鲜活文化时的优越感。“我们走了 400 里路，每到一处都能发现一片歌的海洋。在广大乡村，男女老少都会唱歌。”学

<sup>21</sup> Ma Ke (原文拼作 Ma Ko). ‘From “Yangko” Opera to “The White-Haired Girl”’. *Peking Review*, 6, no. 21 (May 1962): 20–22.

<sup>22</sup>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sup>23</sup> Ma Ke. ‘From “Yangko” Opera to “The White-Haired Girl”’, 20–22.

习农民的歌谣，了解他们的需求，认识他们求解放的决心，是“知识分子大众化”的一种虚心的努力。<sup>24</sup>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可开始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歌剧之一《白毛女》作曲。该剧后来在 1951 年被改编为电影，1965 年改编为芭蕾舞剧。故事主角叫杨喜儿，是一个农村姑娘，为了给爹还债被强卖给地主，与未婚夫王大春分离。她后来逃入深山，在苦难求生中头发变白。而王大春加入了共产党的新四军。当两人最终团聚时，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恋人，更是革命战友。

这一阶级斗争中的革命爱情故事并不全是虚构的，它源自在中国北方乡村流传的“白发女鬼”民间传说。马可和同学在下农村时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们将这个本地传奇故事增添了音乐形式和革命内容，创作了举国闻名的经典作品。这部歌剧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体现了延安座谈会所提倡的理念，特别是艺术家、作家必须学习和沉浸于本地情况和群众文化形式。

这些文化工作者尤其关注民间歌舞，特别是秧歌。以往用来歌颂神灵和地主的民歌如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容，以弘扬革命精神，鼓舞前线战士。广受流传的歌曲有《南泥湾》（讲述了延安附近的一个山谷），词作者贺敬之也是歌剧《白毛女》的编剧，歌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源于群众文化，将政治宣传寓于流行旋律之中。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建设全新的革命文化并不意味着抛弃之前的一切文化，无论其源头是古代的、封建的还是外国的；它意味着要“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就是所谓的“旧瓶新酒”。<sup>25</sup>

正如传统文化形式被赋予新的革命内容，传统知识分子的“旧瓶”也正被改造为服务于人民的“新”知识分子。最能诠释这一改造过程的作家莫过于丁玲。当丁玲从大都市上海来到尘土漫漫的延安田野时，她已经是知名作家，成名小说

---

<sup>24</sup> 同上

<sup>25</sup> Li Huanhua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an’an Yangg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 no. 2 (2021): 35–39.

《莎菲女士的日记》讲述了现代城市女性的处境。然而，到达延安后，她难以写出描绘农民生活的地道文字，那时候她对他们的生活还不熟悉；她还在努力克服自己的偏见、个人主义倾向以及对人民群众的疏离感。丁玲等作家在描写阶级斗争背景下的农民时遇到的困难并不仅仅缘于他们的局限性，而且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尚未在人民中创造出革命意识。文学史专家王小平表示：“革命（无产阶级）意识并没有在现代中国自然发生，而是必须通过被辩证政治理论武装的资深革命家进行培养并提升到更高水平。”<sup>26</sup> 丁玲的长篇小说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改造过程，也体现了他们为了在知识上、政治上与人民群众结合而破旧立新的努力，这又反过来深化了阶级意识。

丁玲跨越的道路反映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指明的“与群众结合”过程：“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到达延安近10年后，丁玲于1948年写成了她第一部描写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的源泉来自她那些年在极偏远的农村地区与妇女、农民、工人、复员军人、干部等共同工作生活的经历。多年后，跟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的知识分子一样，丁玲仍对延安精神矢志不渝。1980年，距离她以81岁辞世仅剩几年，她在最后某次讲话里讲到：“吃苦受罪，但收获也很大……我写不了将军，因为我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但我可以写农民，写工人，写一些平常人，因为我熟悉他们。”<sup>27</sup> 充分了解群众，是她和数万知识分子在延安座谈会之后的数年中矢志以求的，他们对中国人民和国家走向革命胜利也有一份功劳。丁玲在讲话中精辟地总结了延安精神：“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丁玲的话肯定了文化艺术对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召唤今天投身人民斗争、忠于理想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沿着她的足迹前进。

---

<sup>26</sup> Wang Xiaoping, *Contending for the 'Chinese Moder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 (Leiden: Brill, 2019), 575.

<sup>27</sup> 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江西省九江市庐山，1980年8月





上图：戏剧生在晨练

下图：八路军生产旅在延安东南南泥湾耕地

图源：延安红云平台及未知来源

## 延安精神传承 80 年

《讲话》于 1943 年 10 月 19 日首次出版后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在全世界数百万人民中引起共鸣。<sup>28</sup> 来自延安的木刻版画以及毛泽东关于艺术家要体验民间疾苦的号召令印度艺术家奇塔普罗萨德深受启发，他创作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素描，描绘了英国残酷殖民统治末期夺走 300 万生命的 1943-1944 年孟加拉大饥荒。<sup>29</sup> 古巴著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称《讲话》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纲领……有利于理解和确定艺术家和作家在古巴革命中的任务。”<sup>30</sup> 隶属于印尼共产党、有着 20 万会员的印尼人民文化协会（*Lekra*）受到延安精神的指引，形成了“深入群众”的核心方针。<sup>31</sup>

1966 年出版的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中摘录了《讲话》的一些内容，其中倒数第二章专门涉及文化艺术。《语录》有 30 多个语种的正式译本，销售量逾十亿册，为无数革命者收藏，成为有史以来仅次于圣经的全球畅销书。美国黑豹党首任文化部长埃默里·道格拉斯在接受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访谈时回忆道，

<sup>28</sup> Bonnie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na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5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sup>29</sup> Sanjukta Sunderason, 'Framing margins: Mao and vis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India', in *Art, Global Mao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Jacopo Galimberti et a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72–73.

<sup>30</sup> 霍静廉“浅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外的影响”，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 60 周年研讨会，2002 年 5 月 <https://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SQSL200205001016.htm>

<sup>31</sup>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Legacy of Lekra: Organis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Indonesia*, Dossier no. 35, December 2020,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5-lekra/>; Simon Soon, 'Engineering the human soul in 1950s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in *Art, Global Mao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Jacopo Galimberti et al.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53–66.



当年黑豹党在街头巷尾把红宝书与黑豹党党报一起销售，每册 25 美分。两者都传递着艺术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道理。<sup>32</sup> 在朱利叶斯·尼雷尔领导时期的坦桑尼亚，斯瓦希里语版、英语版的红宝书在书店和小镇上出售。毛泽东的思想与非洲的社会主义理念结合，通过电波传向目不识丁的群众、传向乡村。<sup>33</sup>《讲话》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各自的解读和应用，从蒙古到莫桑比克，从阿根廷到阿尔巴尼亚，从秘鲁到菲律宾。

《讲话》可能是来自第三世界、关于文化艺术的作用及其理论、实践、错误、教训的最为重要的系统论述之一。它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民族解放传统中的一种探索、一个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方案、一份文化干部行动指南，一篇文学理论著作，甚至是一篇文学作品。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已过去了 80 年，自那以后，中国已经从世界最穷国家之一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大国。那么，延安精神在当下的重要性何在？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号召重温延安精神，表示作家、艺术家要继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建设植根中国文化、放眼国际的社会主义文化。<sup>34</sup>《讲话》的精神遗产不仅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更是全球南方人民的财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在接受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采访时对毛泽东《讲话》的遗产和重温作出了类似的思考：

（延安文艺座谈会）号召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发展群众文化以确保农民的主体性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那时起直到现在的历史目标。知识分子去农村与农民力量结合。如今我们看到大量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去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和扶贫活动。

35

---

<sup>32</sup> 埃默里·道格拉斯“与翟庭君访谈”，2022 年 3 月 7 日，翟庭君记录

<sup>33</sup> Priya Lal,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 in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ed. Alexander C. C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7–101.

<sup>34</sup>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Forum for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in Beijing, 15 October 2015, <https://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14/10/15/speech-at-the-forum-on-literature-and-art/>.

<sup>35</sup> 吕新雨“与翟庭君访谈”，2022 年 3 月 14 日，翟庭君记录



吕新雨认为，知识分子去农村是延安时代的一个关键榜样，离开它，今天的城乡分化、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贫穷地区的分化就无法解决。2020 年底，中国宣告 14 亿人民告别了极端贫困。<sup>36</sup> 尽管国家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现实困难，吕新雨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应仅仅归功于资本主义成分和市场力量的引入，而应归功于 1949 年以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决心。“延安的故事不仅仅是中国的故事，它属于第三世界，属于二十世纪，属于社会主义运动，属于全世界所有穷苦大众。尤其是在全球局势两极化的当下，我们必须铭记延安精神，不单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球南方。”<sup>37</sup> 80 年之后，我们用《去延安》的歌声铭记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农村的豪情壮志。

黄河边，延水岸

黄土筑高原

窑洞前，石磨碾

仿佛回到昨天

我要去延安

看时间荏苒

看万山红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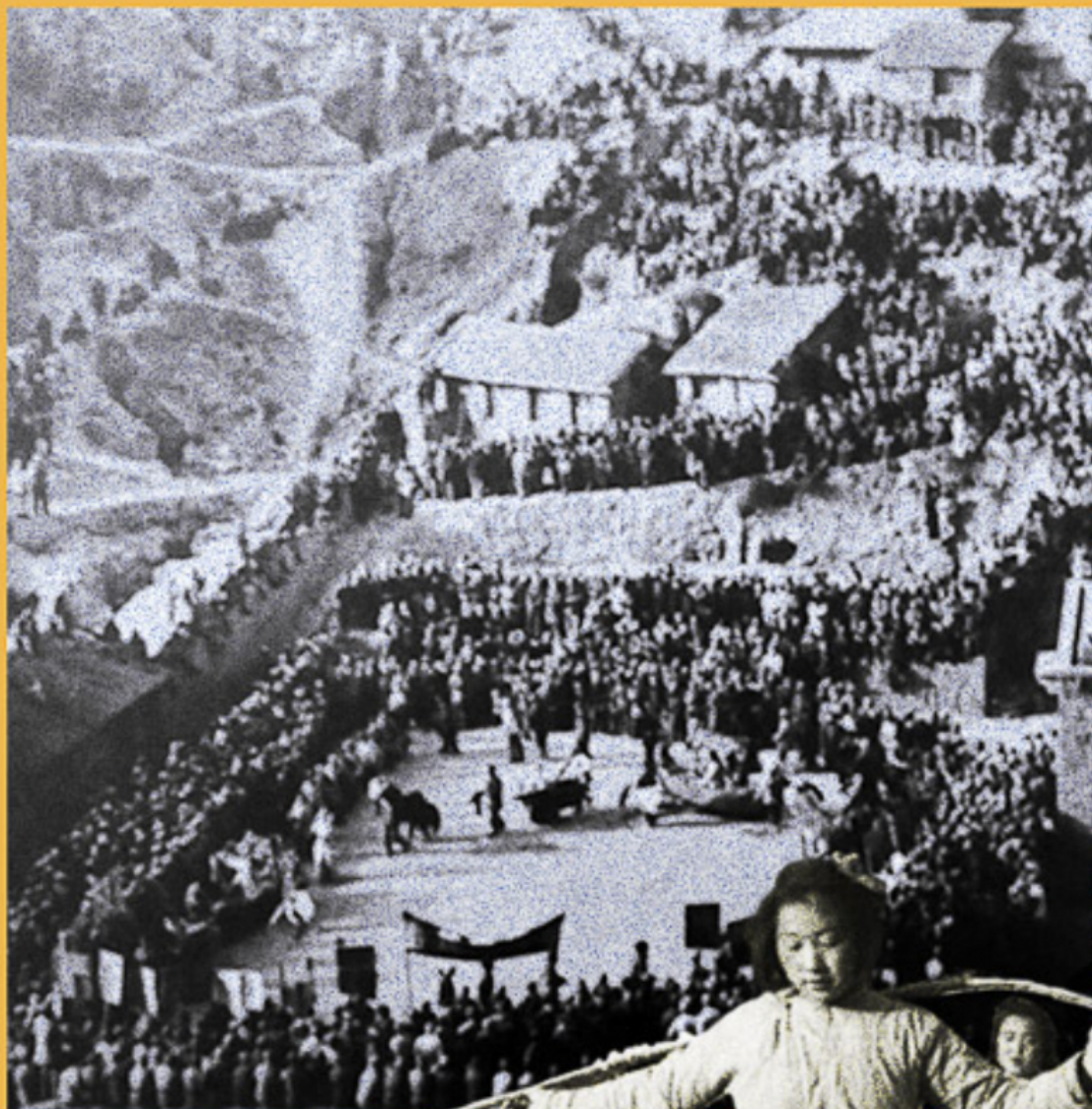
——歌曲《我要去延安》于 2011 年为庆祝建党 90 周年创作，由徐沛东编曲，化方填词，李东演唱

---

<sup>36</sup>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Serve the People: The Eradica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no. 1, July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sup>37</sup> 吕新雨“与翟庭君访谈”





上下图：1943 年春节，秧歌队表演闹秧歌  
图源：延安红云平台、中国青年报

## 参考文献

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的灯塔”，2017年5月20日，

<https://tv.cctv.com/2017/05/20/VIDE0rZPBuMfJZORRpV5dp9170520.shtml>.

CGTN, ‘A quick look at the epic journey of the Long March’, 1 July 2019,

<https://news.cgtn.com/news/2019-07-01/A-quick-look-at-the-epic-journey-of-the-Long-March--HYhdCulxPG/index.html>.

Denton, Kirk A, ‘Yan’an as a site of memory’, In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edited by Marc Andre Matten. Leiden: Brill, 2012.

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江西省九江市庐山，1980年8月

丁晓平“胡乔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28日，

<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1/18270.htm>

埃默里·道格拉斯“与翟庭君的访谈”，2022年3月7日，由翟庭君记录

范雪“到陕北去：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选择”，《保马》，2020年3月16日，

<https://mp.weixin.qq.com/s/CKzJ39SCb78OrNYBS3Yhyw>

Gramsci, Antonio, ‘The Intellectuals’,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Q. Hoare and G.N. Smith, 3–2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71.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problems/intellectuals.htm](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msci/prison_notebooks/problems/intellectuals.htm)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霍静廉“浅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内外的影响”，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 60 周年研讨会，2002 年 5 月，<https://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SQSL200205001016.htm>

蒋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非洲的故事”，《保马》，2015 年 11 月 30 日，<https://mp.weixin.qq.com/s/TqU7-u06Cjd3toX4HB9yhQ>

Judd, Ellen R, ‘Prelude to the “Yan’an Talks”: Problems in Transforming a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Modern China* 11, no. 3 (July 1985): 377–408.

Li Huanhua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an’an Yangg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 no. 2 (2021): 35-39.

吕新雨“与翟庭君的访谈”，2022 年 3 月 14 日，翟庭君记录

Ma Ke, ‘From “Yangko” Opera to “The White-Haired Girl”’, *Peking Review*, 6, no. 21 (May 1962): 20–22.

马克锋“数万青年为何冒着风险奔赴延安？”，《人民论坛》，2021 年 2 月 25 日，<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1/2021-02-25/150570.html>

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3/mswv3\\_08.htm](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3/mswv3_08.htm)

Marx, Karl, *Theses on Feuerbach*. 1845,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theses/>

McDougall, Bonnie,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Meisner, Maurice,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Lal, Priya,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 In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edited by Alexander C. Cook, 96–1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Lenin, V.I., 'On Soviet Power', In *Lenin'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248–24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9/mar/x08.htm>

Lenin, V.I.,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44–4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nov/13.htm>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Rubin, Kyna, 'Writers' Discontent and Party Response in Yan'an Before "Wild Lily": The Manchurian Writers and Zhou Ya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 no. 1 (September 1984): 79–102.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4.

Soon, Simon, 'Engineering the human soul in 1950s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In *Art, Global Mao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Jacopo Galimberti et al, 53–6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Sunderason, Sanjukta, 'Framing margins: Mao and vis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India', In *Art, Global Maoism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Jacopo Galimberti et al, 67–8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Serve the People: The Eradica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no. 1, July 2021.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Legacy of Lekra: Organis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Indonesia*, Dossier no. 35, December 2020.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35-lekra/>.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New Intellectual*, Dossier no. 13, February 2019.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the-new-intellectual/>

Wang Xiaoping, *Contending for the 'Chinese Modern': The Writing of Fiction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ve Epoc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9*, Leiden: Brill, 2019.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in Beijing, 15 October 2014. <https://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14/10/15/speech-at-the-forum-on-literature-and-art/>